

Exploring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from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Subtitling of *Chinese Doctors*

LYU Fangjun¹ YU Deying²

¹ Yantai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² Ludong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rch 14, 2023

Accepted: March 28, 2023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LYU Fangjun & YU Deying. (2023). Exploring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from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English Subtitling of *Chinese Doctor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3), 057–06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3.008](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3.008).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3.008>. p

Abstract: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new media enable translators to become smarter and more professional while their subjectivity is confronted with new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subjectivity. This study takes *Chinese Doctors*, the first Chinese film to record the COVID-19 epidemi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how translators can realize their subjectivity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from four aspects: culture, context, content and express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by coordinating various modes, the translators exercise their subjectivity to the full pl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lot development, thus improving the overseas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audiovisual works and facilitating Chinese culture to go abroad.

Keywords: multimodalit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LYU Fangjun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She is an English teacher at Yantai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 email address is fjunelyu@163.com. YU Dey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udo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Her email address is deyingyu@126.com.

多模態視角下視聽翻譯中的譯者主體性建構 ——以《中國醫生》字幕英譯為例

呂芳君¹ 于德英²

¹ 煙台城市科技職業學院

² 魯東大學

摘要：新興技術及新媒體的出現幫助譯者逐漸走上職業化和智慧化之路，其主體性的發揮面臨著新的挑戰。在數位化的背景下，譯者需要借助時代東風在實踐中增強與觀眾的互動交際，充分發揮譯者的主體性。本研究以中國首部抗擊新冠疫情題材的電影《中國醫生》為研究物件，將多模態話語分析作為理論框架，從文化、語境、內容和表達四大層面分析歸納譯者在視聽翻譯中如何實現自身主體性的建構。研究發現，通過多種模態相互配合，譯者可以根據劇情發揮主體性，提高海外觀眾對中國影視作品的理解與認可，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

關鍵詞：多模態；譯者主體性；視聽翻譯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青年專案「外宣翻譯敘事化助建中國在東盟形象研究」(19CYY012)；魯東大學「聲速輸入法」基金語言文字研究課題「錢鐘書翻譯思想的潛體系研究」(SSYB202114)。

引言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視聽翻譯才真正開始在西方被看作一門獨立研究領域^①。Pérez-González 對視聽翻譯進行了系統性研究與梳理，其著作《視聽翻譯：理論、方法與話題》第六章中強調了多模態在視聽翻譯研究中的重要性，用多模態理論分析了其涵蓋的全部符號系統，他認為關注微觀的文本翻譯同時，對語境要有宏觀的把握^②，這一觀點為視聽翻譯進一步系統化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21 世紀初期，Mona Baker 對視聽翻譯的學科屬性進行定位推動了其成為一門研究學科的進程^③。而國內學界對視聽翻譯的研究較為貧乏^④，尚處在起步階段^⑤，這為翻譯研究帶來了極大的挑戰^⑥。我國雖在視聽翻譯的研究方面落後於西方，但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其實踐上卻能與世界並行，甚至走在世界前列^⑦。

然而，長久以來，以工具論模式占主導的傳統翻譯觀視翻譯為意義的「傳輸」(transfer)或「再現」(representation)^⑧，貶抑譯者作為翻譯活動主體的能動性和意義建構性。此外，在人人可譯的時代，隨著新興技術及新媒體的出現，譯者的地位在一定意義上進一步遭到貶抑。資訊技術的發展弱化了譯者自身的身體技能優勢，加劇了譯者的「隱身」。基於上述問題，不少學者宣導應該加強對譯者和譯者主體性的研究。Robinson 呼籲翻譯研究的譯者轉向^⑨；Venuti 主張採用異化策略使譯者顯身^⑩；Kaindl 認為翻譯研究應採用「人性化」(humanization)的視角，即「在探尋客觀性的過程中，應該包含主體性的視角，主體性的視角是不可

或缺的組成部分」^⑩。

深化對視聽翻譯的研究,尤其是視聽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研究,能夠更好地為視聽翻譯實踐提供理論支撐,推動中國視聽文化「走出去」的進程。2020年初,新冠疫情來勢洶洶,在國家的科學指揮下,醫護工作者在一線爭分奪秒,迅速控制住疫情,及時將新冠病毒的資料與經驗向世界公開。武漢人民團結一心、共克時艱,這一過程需要亦值得通過影視化記錄,讓世界看到中國人民的力量。作為首部以抗擊新冠病毒為題材的電影,《中國醫生》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此類影片的英譯不僅可以扭轉部分西方媒體對中國刻板錯誤的認識,更能向世界展示中國力量、傳播中國聲音。

本文擬從多模態的視角,以中文電影《中國醫生》的字幕英譯為研究物件,分析譯者是如何既完成語言層面的翻譯任務、又利用多種模態要素發揮譯者主體性,從而提高海外觀眾對影片的認可度,實現影片與觀眾之間的理想化交際,有效傳播中國疫情防控的真實聲音。

一、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與視聽翻譯

目前很大一部分視聽翻譯研究只是聚焦在脫離語境的條件下源語和目的語字幕可否實現翻譯對等,並未將說話者之間的對話和其他符號資源的互動考慮在內。而作為一種「符號產品」,電影通過運用背景音樂、人聲等聽覺元素和顏色、圖片、動作等視覺元素呈現了多種物質資源,形成了多種「符號模態」^⑪。這種圖文相融合的媒介為改變翻譯學界對語言模態的偏重、探究語言和非語言符號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

多模態話語是以韓禮德教授系統功能語言學為理論背景,運用言語、圖像、聲音和動作等多種手段,使用聽覺、視覺等進行情感交際的現象^⑫。胡壯麟教授提出,人們要注重系統功能語言學中多模態閱讀能力。基於系統功能語言學,張德祿教授在2009年提出了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這一綜合研究框架獲得了國內學界的普遍認可與使用。他指出,「多模態話語指運用聽覺、視覺、觸覺等多種感覺,通過語言、圖像、聲音、動作等多種手段和符號資源進行交際的現象」。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突破了文字符號的限制,提出利用文字、聽覺與視覺等多種模態符號共同對翻譯作品呈現的語境進行剖析。這種理論不僅可以揭示語言系統意義交換過程裡起到的作用,而且可以剖析圖像、音樂等其他符號系統在此過程中的效果,話語意義的解讀會更準確全面,從而探究出譯者怎樣利用多種模態達到交際目的。

隨著數位時代的科技發展,話語意義經語言、圖像、聲音等多種複雜媒介共同生成與傳播,多媒介性成為社會文化實踐的基本模式,多模態化也相應成為意義構建與互動的普遍特徵。數位化時代的當下,關注視聽翻譯多模態特點的學者不斷增多,多模態已然成為視聽翻譯研究領域的一個嶄新的研究視角框架,即將形成新興的人文學科。不同模態文化下的翻譯行為和興起的交際性翻譯模式都成為了值得關注的研究課題。電影作為視聽翻譯的物件之一,其多種模態的相互配合才能有效展現譯者的主體性,實現文化、語境、內容和表達層面的有效交際。從多模態視角探究視聽翻譯,需要關注不同模態通過何種形式來表達意義。因此,本文通過以張德祿教授歸納的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分析廣受海外好評的電影《中國醫生》裡多種模態在語言和與非語言符號中所發揮的作用,以期為從事視聽翻譯的工作者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實踐建議。

二、《中國醫生》字幕英譯的多模態分析

將多模態翻譯研究擴展到所有模式是將其置於更大的語境中，從而深入研究文本組成和設計的跨文化機制。Kaindl 認為，在二十一世紀，翻譯的主題是一種多模態實踐，翻譯行為是一種多模態符號行為^①。《中國醫生》是首部聚焦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為題材的中文電影，全景式展現中心疫區城市武漢及其各大醫院醫護工作者們抗擊病毒的全過程，刻畫了眾多性格鮮明的一線工作人員，展現了中國戰勝疫情的決心與能力。該部電影片長 129 分鐘，劇情緊湊、節奏較快，對譯者素質的要求高。筆者以張德祿教授提出的多模態話語分析為理論支撐，從四個層面即文化、語境、內容和表達，探討譯者是如何在《中國醫生》視聽翻譯中發揮主體性作用，將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相互影響，實現譯者與觀眾之間的交際互動。

（一）文化層面

根據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文化層面是實現多模態交際的核心，決定了交際傳統、交際形式與交際技術。不同國家的影視作品包含不同的文化因素，將其進行翻譯，讓受眾接納，並非易事^②。鑒於中西文化之間的固有差異，譯者要尊重客觀事實，權衡文化差異，在翻譯中保持客觀性和真誠性，從而達到譯者-觀眾的理想交際。中西物質文化差異一直是視聽翻譯的一大難點，翻譯時僅拘泥於字面會造成理解困難，導致交往活動失敗。從文化層面，譯者要秉持中西有別的原則，體現各國語言風貌和文化特色，尊重原劇的框架結構，再現原臺詞的風格。

例 1 原文字幕：老子全都算到你的頭上

譯文字幕：This will be all on you.

原文字幕：文主任

譯文字幕：Doctor Wen

在以上兩例中，譯者有效發揮主體性作用，考慮到觀眾的接受度，通過減譯、意譯的翻譯方法來處理中文特色稱謂「老子」和「主任」，抓住臺詞傳遞的核心意思進行英譯，讓觀眾毫不費力地明白人物的定位與話語意圖，避免了文化層面的理解困難。此處雖然減少了語言模態的呈現，但其文化資訊仍然可以借助圖像模態呈現。這種雙模態的互補可以確保觀眾可以或多或少地理解電影中文化層面的意義。

例 2 原文字幕：天塌了我也要把她生下來

譯文字幕：Even if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 want to have her.

這句臺詞是隔離中的孕婦小文感動地看著丈夫金仔時說出的。「天塌了」是中文裡特有的俗語，用來比喻意想不到的大禍。如果採取直譯，譯文則生澀難懂。結合劇情內容，譯者發揮其主體性，去掉了「天」這一具體意象，用意譯法幫助觀眾跨越文化障礙，清晰準確地認識到小文作為准媽媽的堅定決心。

例 3 原文字幕：我們就要背鍋了

譯文字幕：We'll be scapegoated?

「背鍋」是近年來網路流行語「背黑鍋」的簡化說法，意思是替他人承擔責任或受過，譯者考慮到觀眾的接受度則用了「scapegoat」一詞作為對應，置換對目標觀眾來講陌生的文化因素，但又保留了源語文化符號，

說明海外觀眾規避文化陌生感,實現了字幕與觀眾的有效交際。

例4 原文字幕:眼見為實

譯文字幕:Let them see for themselves.

這句臺詞是國家衛健委代表得知世界衛生組織將派專員前往武漢做疫情調查時所說,此處譯者的翻譯指代不明確,譯者主體性沒有得到發揮,此處譯文有待改進。「眼見為實,耳聽為虛」是中國古代文化裡的經典成語,強調親眼目睹才是事實。因此,譯者需發揮其主體性,從西方文化中找到與其含義匹配的譯文。此處,筆者認為將原字幕替換成目標觀眾熟知的英語習語「Seeing is believing」可以節省畫面空間,對目標觀眾的理解有一定友好性,從而實現文化層面的理想交際。

(二) 語境層面

根據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話語範圍、話語基調、話語方式決定了語境因素,而語境因素又會制約交際^⑤。視聽翻譯是要實現跨文化交際,也必然會受到語境的限制。胡壯麟教授將語境分為文化語境、情景語境與上下文語境^⑥。在視聽翻譯中,情景語境則指劇情發生的實際背景、所涉人物、時間、地點、動機等。上下文語境則是影片內部的語言環境。譯者在進行視聽翻譯時,需要根據不同的語境進行翻譯調整,準確還原臺詞的語境,從而實現高品質的跨文化交流。

例5 原文字幕:你們一定要隨時監測她的各項數值

譯文字幕:Make sure to keep measuring her vitals.

這句臺詞的發生語境是:身染新冠病毒的八十二歲老人有高血壓、糖尿病等多種基礎老年病,醫護人員需要通過監測她的各項數值瞭解其各大器官的健康狀況。此處譯者沒有受到原臺詞的字面限制,根據情景語境靈活地將「數值」譯成「vitals」即維持生命的重要器官,在情境下形成有效聯繫的對話。譯者選擇從情境出發,確保翻譯內容符合事實邏輯與人物特點,減少了觀眾語言層面和情境層面的理解障礙,譯語忠實地道。

例6 原文字幕:全員離床

原文字幕:電

譯文字幕:Clear.

以上兩句臺詞都是醫生在重症監護室進行急救時的臺詞,其情景語境均為患者心跳驟停,需要立即進行電除顫刺激心肺復蘇。為防止包括操作者在內的醫護人員觸電,所有人的身體不能與病人接觸,才能進行除顫救治。在這種危急情境下,快速交替的臺詞與畫面要求翻譯簡潔、易懂。譯者將「全員離床」與「電」這兩個同時進行的動作都譯為「clear」與語境可以快速對應起來,對畫面視覺模態的補充提供了輔助作用。這種目的語字幕與畫面的相互契合為觀眾在視覺上直接獲取情景語境關鍵字提供了有利條件。

例7 原文字幕:金仔他不聽話

譯文字幕:I told him not to go.

影片開頭,醫護人員將在家中自我隔離的孕婦小文帶入醫院治療。走前,小文囑咐丈夫金仔于家中隔離,特殊時期不要出門接外賣訂單。可小文治癒出院後,得知丈夫送外賣時與感染者有過接觸,不幸感染了新冠。在此情境下,小文說出了例7中的臺詞。譯者結合上下文語境,把臺詞中小文曾告誡過金仔的隱含意

思譯出,與影片初期小文的臺詞相呼應,便於觀眾理解前後語境,減少字幕給目標觀眾帶來的破壞與衝突。

例 8 原文字幕:早知道是這個結果

還不如跟別人一樣跑出去

譯文字幕:If only I knew this would happen,

I would have run like the others.

此處臺詞的語境是:面對日益增多的新冠患者,不少清潔和陪護工人害怕感染新冠,選擇離崗回家。在此情境下,部分醫生也出現了畏難心理,說出了以上臺詞。譯者在此處將「跑」直譯,並沒有照顧到上下文語境的銜接。該句臺詞之後,院長則分析局勢作動員,在形容畏難人群時用了「走」一字,而此時譯者採取了意譯的翻譯策略,將其譯成了「leave」,更加符合當下語境。因此,筆者認為此處應該發揮其主體性作用,採用意譯策略,與上下文語境相一致,改用「leave」一詞配合視覺模態,才能更加實現語境層面的交際意義。

(三) 內容層面

多模態語態從內容層面看可以分為話語意義和形式兩種。前者則是人物的語言內容,譯者可以在保留本質內容的基礎上,對臺詞進行增減翻譯。後者在視聽翻譯上往往表現在配樂等聽覺模式和圖像等視覺模式上。形式意義表現多元,多種感官搭配,可以營造理想氛圍,推動劇情發展,充分帶動觀眾情緒,保證傳播與交際效果。

例 9 原文字幕:馬上通知各科室開會

譯文字幕:Call an emergency meeting with all departments now.

這句臺詞是武漢金銀潭醫院的院長在面對數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緊急情況下說出的。因此,這句臺詞的翻譯需將情況的緊迫之感體現出來,譯者根據內容增譯了「emergency」一詞,可以在影片之初迅速將觀眾拉入既定劇情之中。此處情節節奏較快,因此需要利用語言模態為目的語觀眾提供必要資訊,結合視覺模態,實現譯者與觀眾之間的有效溝通。

例 10 原文字幕:—2020 年 1 月 23 日

—武漢 10 時

—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

譯文字幕:— January 23rd, 2020. From 10 AM onwards, Wuhan suspended

— All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all outbound flights and trains.



圖 1



影片開頭的第 12 分鐘,電視新聞報導稱國家發佈通告,堅決抑制病毒蔓延。此後有長達 30 秒視頻通過全景航拍與特寫鏡頭,聚焦展現了武漢交通全面停運、超市顧客哄搶商品、醫院大廳人滿為患等畫面,以真實的現實視角搭配搖晃鏡頭的拍攝手法凸顯事態的嚴峻,直接地形成視覺壓力。例 10 則是 30 秒視頻裡的一幀畫面,時鐘圖像、敲鐘的音效以及譯者增譯的「all outbound flights and trains」即「出境航班與火車」共同向觀眾提供視覺和聽覺資訊,奠定劇情的走向——封城抗疫。結合沉重和緊迫的配樂,譯者在畫面左下方配有雙語字幕且放大了中文字幕,向觀眾直觀地提供了必要背景資訊。視覺模態與聽覺模態之間相互補充交代了中國面對全球突發衛生事件第一時間的具體措施和實際情況,也加強了觀眾對武漢嚴峻形勢的認知。層層畫面的視覺模態與背景音樂等聽覺模態共同作用,互為補充,促進了劇情在邏輯上的銜接,有助於帶動目標觀眾的情緒,為事件發展作鋪墊。

例 11 原文字幕:—(長路漫漫意志從不頹廢)

—(倔強的身影 勇敢闖過南與北)

—(滿城的風雨 依然傲氣不撤退)

譯文字幕:—(The will shall never fade, infinitely.)

—(A stubborn shadow, bravely leaping all the way.)

—(The lasting storm brews, looking it is here to stay.)



圖 2

圖 2 的三幀畫面是金仔在接受搶救時想像與妻女重逢的畫面,一家三口相遇後徐徐配樂推進,人聲配樂與旋轉鏡頭相配合襯托了一家團圓的溫馨畫面。該段劇情通過人物行為與背景音樂的配合將觀眾帶入情境,歌詞的位置不宜喧賓奪主。因此,製作方將中英文歌詞加括弧出現在畫面右下角,使中英文歌詞字幕與臺詞字幕的呈現形式和位置相區別。此外,每句中文歌詞結尾押韻,譯者在英譯時也考慮到了尾韻的問題。譯者充分發揮了其主體性作用,在兼顧歌詞內容的同時也對尾韻做了押韻處理,伴隨著溫暖的男聲配樂,營造了恰當的多模態情境。通過畫面、配樂以及雙語字幕等多模態之間的相互合作,可以傳遞出各角色抗擊疫情的勇氣與決心,有效地讓觀眾快速共情、全面理解整體的敘事情節。

(四) 表達層面

表達層面又稱媒體層面,分為語言和非語言兩種。語言層面包括配樂、字幕大小、長短和佈局等。非語言層面則包含人物身體動作、工具、環境等。根據傳統語言學研究,聲波傳導的聲音符號和由筆等生成的書寫符號是實現意義傳播和資訊傳播的兩種主要媒體形式。視聽翻譯字幕空間和顯示時間有限,在其他模態工具的輔助下,譯者需要生成簡明且達意的書寫符號,從而減輕觀眾的認知負擔。

由於《中國醫生》這部影片中涉及很多醫學術語,譯者考慮到字幕長度、讀者友好、出現頻率等因素,將部分常用詞彙直接用縮略語表述,見表 1。對於目標觀眾來說,這些早已熟知的縮略語可以實現語言層面的意義補償,減輕觀看與理解負擔,以便結合聽覺與視覺資訊把握電影劇情。

表 1

中文	英文	縮略形式	出現次數
重症監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14
防護服/用品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11
體外人工膜肺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	11
中心靜脈穿刺	central venous catheterization	CVC	2
五官	ear, nose, and throat	ENT	1
點滴	intravenous injection	IV	1

在電影中,雖然有縮略語的使用,但從表 1 可以看出:譯者只在醫學術語的翻譯上使用了縮略語。根據筆者統計,該影片中「儘快」一詞共出現了 6 次,翻譯時會增加英文字幕長度。因此,此處譯者可以發揮其主體性作用,將目的語字幕「as soon as possible」直接譯為目標觀眾熟知的縮略語「ASAP」。這樣一來,可以保證字幕的對應性與即時性,也拉近了目標觀眾與字幕內容的距離。

例 12 原文字幕:—全武漢市都找不到氧氣瓶

—我有些事情 我先掛了
—氧氣瓶特別難弄現在
—我一會兒給你打過來

譯文字幕:— We can't find any tanks in the city.

— I'm busy right now, I have to hang up.
— Oxygen tanks are impossible to get right now.
— I'll call you back in a bit.



圖 3



圖 4

在媒體層面,《中國醫生》在多處多人物對話字幕的處理上也體現了多模態的重要性。例 12 中,從語言符號層面看,院長作為雙向人物需要同時處理兩組對話情境,字幕必須將說話者加以區分以便觀眾及時獲取劇情。此例中,字幕製作方巧妙地將字幕分成左右兩區,與視頻裡主要講話者的畫面位置達成同向,優化了語言層面的觀影視角。譯者將人物的含蓄說法「我有些事情」直接意譯成「I'm busy right now」(我現在很忙)也會將觀眾準確帶入劇情之中,營造出一種緊張的氛圍。在非語言層面,圖 3 正面鏡頭裡的兩人眉頭緊皺,神情急迫表明了事態的緊急,為院長掛掉妻子電話做鋪墊。圖 4 畫面裡只有院長妻子一人,暗示妻子獨自面對病情,但手拿電話表情鎮定,體現了妻子對丈夫工作的理解與支持。該片段的配音對於觀眾理順劇情邏輯也起到了關鍵作用,工作人員的臺詞「全武漢市都找不到氧氣瓶」與院長的「我有些事情」同時同步輸出,但製作方將工作人員的音量明顯蓋住院長,凸顯了事態的緊急,暗示院長需要先履行「院長」的職責,再照顧自己的家人。通過利用聽覺模態與語言等視覺模態相互補充可以快速讓觀眾定位角色,將配音、畫面與字幕構成有機整體,縮小譯文與畫面的隔離感,在減少畫面和字幕切換的基礎上,說明觀眾有效獲取資訊、理解資訊。

三、結語

中文電影《中國醫生》字幕的英譯將文字和語言符號與視覺、聽覺等非語言符號互相配合,保證傳遞與交流效果,達到文化交際的目的。在文化層面,譯者考慮到觀眾的語言習慣,通過減譯、增譯等翻譯方法來縮小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更好地促進了文化的輸出;在語境層面,充分發揮譯者的主觀能動性,將關鍵字句採取意譯的翻譯策略,加強觀眾對上下文語境和情境語境的進一步認知;在內容層面,將語言與形式意義相結合,文字、配樂與畫面共同合力,便於目標觀眾理解劇情、產生情感共鳴;在媒體層面,語言與非語言層面相互合作,減輕觀眾的理解困難,提高觀眾對影片的認可度。多模式語態與視聽翻譯聯繫緊密,譯者可以在發揮其主體性的基礎上,通過字幕翻譯實現與電影畫面、配樂等介質的互相配合,讓語言和非語言符號進行融合性輸出。在數位化時代下,字幕工作者需要從多模態視角下提高譯者素質,在視聽翻譯中發揮譯者主體性,促進中國文化產品的有效「出海」。

注釋

- ① Gambier, Y. (2008).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research*// Chiaro D., Heiss C. & Bucaria C. (eds.). *Between Text and Image: Updating Research in Screen Translation*.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② Pérez-González L. (2014).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Theories, methods and issu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③ Baker M. & Saldanha G. (2020).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④ 董海雅:《西方語境下的影視翻譯研究概覽》,《上海翻譯》2007 年第 1 期,頁 12-17。
- ⑤ 呂潔:《2000—2012 年間西方視聽翻譯的研究》,《上海翻譯》2013 年第 4 期,頁 68-72。
- ⑥ 劉大燕:《析視聽翻譯名稱演變:從電影翻譯到多媒體翻譯》,《上海翻譯》2010 年第 4 期,頁 61-65。
- ⑦ 鄧微波:《從電影翻譯到視聽翻譯——國內視聽翻譯實踐的歷史與現狀探究》,《中國翻譯》2016 年第 1 期,頁 80-84。
- ⑧ Venuti, L. (2019). *Contra Instrumentalism: A Translation Polemic*.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⑨ Robinson, D. (1991). *The Translator's Tur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⑩ Venuti, L. (1995).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⑪ Kaindl, K. (2021). (Literary) translator studies: Shaping the field// Kaindl K. & Kolb W. & Schlager D. (eds.). *Literary Translator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38.
- ⑫ Kress, G. & van Leeuwen T. (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⑬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 ⑭ 胡壯麟:《社會符號學研究中的多模態化》,《語言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1期,頁1-10。
- ⑮ 張德祿:《多模態話語分析綜合理論框架探索》,《中國外語》2009年第1期,頁24-28。
- ⑯ 朱永生:《多模態話語分析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外語學刊》2007年第5期,頁85。
- ⑰ 吳贊:《媒介轉向下的多模態翻譯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頁116。
- ⑱ 馮德正,張德祿,O'Halloran K:《多模態語篇分析的進展與前言》,《當代語言學》2014年第1期,頁88-99。
- ⑲ 張德祿,王正:《多模態互動分析框架探索》,《中國外語》2016年第2期,頁55。
- ⑳ Kaindl, K. (2019).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 multimodal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Multimodality* (pp. 49-7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㉑ 王建華,周瑩,張靜茗:《中國影視翻譯研究三十年(1989—2018)——基於 CiteSpace 的視覺化分析》,《上海翻譯》2019年第2期,頁35。
- ㉒ 胡壯麟著:《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上海外國語出版社1994年版。

(Editors: Bonnie WANG & JIANG Qing)